

■军旅生涯■

那一年 我们集体待命

■朝花夕拾■

空药瓶

上世纪 70 年代初，农村缺医少药，人们生病后，都是找赤脚医生开点药，用纸包着，很少见到整瓶的药。所以，小药瓶在我们孩子眼里十分稀罕。谁要是有个空药瓶，都会特别兴奋。有时候，我们将空药瓶装入肥皂水，用塑料管吹出五彩缤纷的泡泡，觉得太好玩了。

小时候，我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毛病，一犯病，母亲就带我去打针。打针钻心地疼，所以每次打针，我都大哭大闹，直到医生将一个空药瓶塞在我手上，我才破涕为笑。因为我手头总有空药瓶，小伙伴们都乐意跟我玩，他们常常把自己珍藏的宝贝拿出来，跟我换药瓶。

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缺医少药的年代已经走远。如今的孩子，拥有五花八门的玩具，拥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哪里还会像我们当年那样稀罕空药瓶？

明伟方/文

（编辑提醒：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可信，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要素。）

在人民大会堂开会

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我省应邀参加会议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位是沧州市青县县委书记李新平。

11 月 4 日上午 8 点，我和与会同志一道经过严格的安检，由大会堂西门进入人民大会堂。

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广西厅召开，由民政部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后，我向河北省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领导小组起草了关于这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图为大会请柬。 武银祥/文并供图

垒球台

暑假到了，街心公园的乒乓球场地来了许多打球的孩子。看着他们打球，不由得想起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垒球台的事。

那是 1970 年冬天，我在石家庄市前进村小学读五年级。有一天看电影，电影放映前有加片《新闻简报》，报道了中国乒乓球男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消息，我和同学们很受鼓舞，也想打乒乓球。第二天，我们找到校长边玉晨，请学校搭一个乒乓球台。校长说：“你们想有，我也想有，就是没钱！”

确实，那时我们学校太穷，体育课跳绳用的绳子是从生产队借的，而且只有三年级以上才可以用，三年级以下的只能走步、跑步、丢手绢。

大家很失望，这时有个同学突然

想到利用冬天“滴水成冰”的方法，浇个冰面当球台，大家一听就来了兴趣。放学后，住在学校后面的同学飞快地跑回家，拿来盆、桶、瓦刀等工具。由两人负责垒球台，其他人负责找砖和泥，女生负责抬水端水。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球台初步成形，我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可是还没高兴一会儿，只见水从砖缝往外漏，我和几个男生忙用手抓起泥巴堵上去。然而，堵了这边那边又漏，越堵漏的地方越多，突然听到“咕咚”几声响，砖台倒了，泥水哗的一下涌出来。幸亏我们躲得快才没伤着，但浑身上下沾满了泥。

这天傍晚，我们的球台泡汤了。

陈建民/文

组讨论。

政治学习结束后，紧接着转入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活动。活动结束后，团首长传达了上级要我们团准备开赴福建前线参加炮击金门的战斗命令。接着，团首长给我们作了形势报告，他说：“长期以来，盘踞在金门岛屿上的蒋匪军经常炮击我沿海地区。炸死炸伤我方军民，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派军舰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的领土主权。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向美国军舰和金门岛上的蒋匪军进行最猛烈的炮火打击。”

舰和金门岛上的蒋匪军进行最猛烈的炮火打击。”

同志们听了首长的报告，对美蒋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表示强烈的愤慨，人人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一次次地写请战书，要求赶快上战场。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部队每天都在忙着战前的准备工作，为了战时能够反应迅速，部队要求轻装上阵。个人超过规定数量的东西都要寄回老家，时间如果来不及，就先寄存在老乡家里。我们驻地离县城较远，没有时间寄，都是寄存在老乡家里。

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着上级一声令下，立刻开赴战场。就在我们耐心等待着的时候，部队突然宣布，事情有变，从即日起，准备行动改为待命。待命期间可以训练，边训练边待命。

此后，部队按原计划进行训练。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我们于年底前圆满完成训练任务，高唱着凯歌回营。回营后，在一次团军人大会上，我们才知道上级取消了我们团参加炮击金门的命令。

张旭光/文

我参加高考的奇葩事

公社派了一辆大卡车，将报名高考的知青集中送到几十公里外的一处考点。

说实话，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考题并不难，但对于我们这些上学时赶上“罢课闹革命”、之后又在农村苦干了两年多的知青来说，难度实在是不小。

好歹答完了所有试题，试题内容和考试细节都记不清了。

回到知青点，就开始填报志愿。

到了年底，公社在醒目位置张贴了“初选名单”，即为初步过线的考生名单——这个程序好像也与现在的高考不同。我所在的公社只有两人榜上有名，我是其中之一。我当时那个得意劲儿，没法形容。

到了 1978 年春天，录取通

知书来了。我一看，录取我的，居然是大山里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时不知天高地厚，因为喜欢看书，所以报的都是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的文科专业。结果却是这么个学校！由于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开始我并不想去报到，想再复习一年，参加下一年的高考。

然而，架不住父亲的逼迫，我只能前往学校报到。

奇葩的是，到了师范学校，居然得到通知，说学校今年没有中文专业，只有物理和化学两个新专业。如果实在想上中文系，只能插班到 1976 级中文系，与过去靠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学习。想来想去，我并

是，咬咬牙，同意到化学系上学。

更奇葩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同学，可谓老中青少“四代同堂”。记得同学中年纪最大的是“大老王”，当年 57 岁，还有一位老李 55 岁，前者是工厂的工人，后者是农村的民办教师；中年人就更多了，当年都是 40 来岁，女的居多。当年班里有一位女同学，就是带着孩子来上学的。我们班长也是 40 来岁的中年人，上学前是一个公社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说到“青”，基本上就是指我们这帮下乡知青，当时都是 20 岁出头；至于“少”，指的是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年纪多在十五六岁左右。就这样，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同学们汇聚一堂，听老师传道授业解惑。

高越/文



■图说往事■



我是河北省民政厅的一位退休干部，2009 年 5 月退休。2008 年 10 月底，我收到民政部关于参加 11 月 4 日“纪念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的邀请函和人民大会堂的请柬。我非常激动，这